

“钻研古戏文犹如钻研严峻的人生”

—怀念王季思

□曹凌云

在编辑《唐湜全集》的过程中,我多次读到唐湜先生怀念他的二舅王季思先生的文字,饱含深情,打动人心。上个月,与远在新西兰的王则椿先生通过微信视频进行长时间的交谈,话题也始终没有离开他的父亲王季思。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我与九叶派诗人唐湜先生有过频繁交往,当时我在温州市龙湾区工作,唐湜多次说:我二舅王季思也可以说是龙湾人。就这样,我开始关注王季思先生的文史著作和生平故事。

王季思是如何与戏曲结缘的?得从他的家乡温州说起。

温州是宋元南戏的发源地,在中国戏曲曲艺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。戏曲在温州民间繁衍兴盛,流行昆剧、瓯剧、越剧以及和剧、高腔、木偶戏等。元末明初,温州剧作家高则诚潜心创作的《琵琶记》问世后蜚声剧坛,达到“演习梨园,几半天下”的盛况,代表了南戏艺术的最高成就。明清时期,由南戏演变出的各种声腔剧种,传遍大江南北,而在温州更是戏文不断,逢年过节、求神祭祀,甚至老人长寿、婴儿满月,常有戏班上台尽情演绎,营造氛围,余音绕梁。

清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,王季思出生在温州老城东郊的上田村。唐湜先生说:季思舅舅祖籍在龙湾永中的永昌堡,家境殷实,祖父和父亲都是秀才。他从小就爱看戏,戏班在村里演戏的日子,就是他的节日,夜空、明月、树影,煤气灯闪亮亮,大幕后吹吹打打,演员们进进出出,都能让他兴奋。小小年纪的他,已纠结于戏台剧情的跌宕起伏和小生小姐的悲欢离合,懂得了憎恨嫌贫爱富的员外相公、同情守节尽孝的善良妇女。在没有看戏的日子里,他和小伙伴一起用竹枝作刀枪,插菖蒲作翎子,模仿演员来一场武打戏,那一招一式也像模像样。戏以载道,寓教于乐,这些延续在乡野民间的剧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民国十四年(1925年),他用王起、王国樞两个名字报考了两所大学,结果被南京东南大学录取。离家读书,却没有离开戏剧,他在大学里遇到同样爱看戏的词曲大师吴梅。四年的大学生涯,王季思汲取了丰富的古典戏曲精华,在品性、学养、见识方面都得到提升。

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浙江、安徽、上海教学,并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戏曲。他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部分元剧和吴梅、王国樞的著作,得其精髓,又加上他年少时看过大量社戏,有了研究的基础和灵感。在动荡的生活中,他每天晚上在冒着青烟的菜油灯下钻研到深夜。他确定研究注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,可是,《西厢记》由文有大量典故,曲白中夹杂着北方各地的方言、俗语。他毫不吝啬时间,对《西厢记》的几种版本进行校勘,

有一次,爱好体育的王季思在操场上踢足球踢累了,回到“风雨龙吟楼”自己的房间里,趴在桌子上小憩,此时正好有斜阳映照进来,把他的身影投射在板壁上。同住一室的老乡夏承焘见状,拿粉笔把他的影子轮廓勾勒下来,结果像一头老虎,夏承焘又在板壁上加了“睡虎图”三字。由于王季思平时不苟言笑,举止严肃认真,好与人争执论理,“王老虎”的绰号就在同学中传开了。

王季思对待工作一丝不苟、事必躬亲,

对待学生宽厚仁爱、关怀备至,他收藏的图书、资料,随便让学生翻检,多年积累的卡片、笔记也提供给学生。遇到什么开心事,他常请学生吃蟹喝酒。在师生们的记忆里,王季思与人为善、热心诚恳。

1947年暑假,浙大进步学生薛天祀和夏文俊在杭州被国民党逮捕,王季思和夏承

得知消息后不顾自身安危,奔走营救。1949年,王季思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,7月,中大学生赖春泉被捕,国民党秘密判处他死刑。地下党派人找到王季思,请他出面保释营救,他亲自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为赖春泉办理保释手续。

1948年夏天,42岁的王季思经老乡、历史学家刘节介绍,从杭州南下广州,到中山大学任教,一任就是42年,可谓是落地生根,无怨无悔。在这漫长的岁月里,他随着时代大潮起伏,但几乎没有停止学术研究的步伐。他发表论文,出版专著,享誉海内外,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论和古典戏曲研究的名家。

王季思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山大学第一届中文系主任,他带领学生成立“泥土社”,鼓励学生多创作文学作品。“泥土社”的寓意即为文学来源于生活,植根于泥土、立足于大地。

1962年,王季思受教育部之聘到了北京大学,参与编写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《中国文学史》,负责宋、元、明、清部分。经过三年编辑,《中国文学史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,为教育部推荐教材,被全国高校普遍采用30年之久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王季思受教育部委托,在中山大学主持举办全国高校中青年教师古代戏曲研讨班,为全国高校培养一批研究古代戏曲的骨干教师。他还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,中山大学中文系也成为全国首批古代文学的博士点之一。他同时还带领一批中青年学者编纂出版了《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》《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》等书籍。

1985年,时年79岁高龄的王季思依然有着使不完的劲儿,他领衔编校《全元戏曲》,但他不做挂名主编,与十几位不同年龄的编辑一起,定本、选目、标点、校勘、注释、眉批以及撰写题解等工作。他每天清晨起床,坐在书桌前看稿、编稿,忙个不停,全书所有的稿件他都逐页批阅,圈圈点点,纠正错误。几年后,他的手开始颤抖,口水也控制不住,为了避免弄脏书稿,他戴着大口罩伏案工作。1999年,十二卷本的厚重之作《全元戏曲》出齐,这是中国古典戏曲的又一巨作。这期间,王季思的许多学术论文也陆续结集出版。以心为笔,以血为墨,几十载潜心钻研,几十载耕耘不歇,他出版的书稿字数达300万字。

王季思在中山大学播下了戏曲研究的种子,一批中青年学者逐步成长,出现研究的学术梯队,中山大学也成了中国戏曲研究的中心之一,而王季思无疑成为中山大学中国古代戏曲研究的一面旗帜。王季思热爱文学,倾力教学的一生,正如温籍作家、翻译家赵瑞蕻先生对他的评价:“钻研古戏文犹如钻研严峻的人生”。

王季思对待工作一丝不苟、事必躬亲,

对待学生宽厚仁爱、关怀备至,他收藏的图书、资料,随便让学生翻检,多年积累的卡片、笔记也提供给学生。遇到什么开心事,他常请学生吃蟹喝酒。在师生们的记忆里,王季思与人为善、热心诚恳。

1947年暑假,浙大进步学生薛天祀和夏文俊在杭州被国民党逮捕,王季思和夏承

承蒙编委老师对“汪曾祺孙女”这个身份的看重,我有幸在《汪曾祺别集》之《晚饭后的故事》《梨园集》两册做挂名主编。其实,以我对现当代文学的认知和对汪曾祺作品的解读水平,实在达不到作为“别集”编委的门槛儿,实际参与的工作也实在寥寥。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“为什么是汪曾祺”。

在百度搜索汪曾祺的名字,页面显示共有3580万个相关结果,真真吓了我一跳。再一细查,豆瓣读书上收录了他211册(套)作品,有7450个粉丝关注,新浪微博上有他的超话,还有人专门在学术期刊上刊发过《新浪微博“汪曾祺栀子花”现象解析》,深入研究了为何自2016年以来,每年都有粉丝量高达百万、千万量级的自媒体大V大号,以及高校、媒体官微等接力转发汪曾祺的作品片段,并登上微博热搜。

倒退回二十几年前,我学生时代的语文老师们不少都没有听过汪曾祺这个“非著名”作家。而时至今日,汪曾祺俨然已成为了主流文学圈儿里的“网红”代表,这不得不说是一件趣事。当然,相信这种流量和热度,也是汪曾祺去世20年后,越来越多出版社选印他作品的重要理由,我觉得也是值得当代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关注的一种现象。

那么,为什么是汪曾祺?

为什么在传统严肃文学的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日渐式微的当下,网络上每天都有无数人分享他的某一席话、某几句词、某几篇文章?

为什么过去3天里,《徙》里县立五小的一句歌词“愿少年,乘风破浪,他日毋忘化雨功!”连续出现在吉林大学、湖南大学、上海财经大学等诸多高校的官博上?

为什么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告诉我,他们家里还在上小学的孩子缠着他(她),要去书店买一本汪曾祺爷爷的书?

王干老师前段时间在南京财经大学做了一场讲座,提出汪曾祺之所以成为了网络时代的一个现象级人物,在于其创作的包容性和厚度,实现了“古今、中外、南北、雅俗、现当代”五个层面的“打通”。这场讲座是面向新闻学院学生的,专业性比较强。我觉得从网生代普通读者的直观感受出发,不说教、不矫情、不沉重,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,带着鲜活的烟火气,极容易带入和共情,文字却又是无比的妥帖讲究,这才是老头儿的作品既能安放于书阁之上,又能游动于网络之间的原因。

当然,一些拥趸可能会觉得网络的断章取义割裂了作品的“文气”,但换个角度看,这种既能征服精英学者又能吸引微博草根的语言的精彩和醒目,也正代表着老头儿作品的独特魅力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,能否获得更多读者的喜爱和认同,无疑都是评判一个作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。当代的文学应当更加尊重多元化和多样性,对于作者和



读者都给予更多的包容和宽待。

我念小学的时候,按照老师要求买过一本《文学描写词典》,里面收录了很多名家大师的经典语段,用来给自己写作文“加词儿”。记得关于“眼睛”的条目收了《受戒》写大小英子的一段话:“两个女儿,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。眼睛长得尤其像,白眼珠鸭蛋青,黑眼珠棋子黑,定神时如清水,闪动时像星星。浑身上上下头是头,脚是脚。头发滑溜溜的,衣服格格净净的。”

初时看到教辅书里有爷爷的作品时,我还是很有些骄傲激动的。仔细读了几遍,顿时熄了向小伙伴们炫耀的心思:“头是头,脚是脚”,这都是什么呀,写作文时这么放上去还不被老师把分扣光!没词儿!

谁成想,过了没多少年,《受戒》居然进了语文课本。这挺好,证明语文教育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更强了。更可喜的是,很多年轻的读者或是从课本开始,或是从网络出发,进行了更深更广的阅读。他们“入坑”也许是因吐槽、搞笑、美食、鸡汤,也许是因老头儿的可爱、老头儿的好玩儿、老头儿的清新不做作,但只要沉下心来静静地读,就一定会被传统文化的美、语言文字的韵、慢淌静流的情所打动。届时,自可入手《别集》一套,相信这套权威学者、资深汪迷倾力编印的作品汇编,一定会带读者走近一个更加立体、更加真实、更加鲜活的汪曾祺。

豆瓣上有这样一篇书评:“自汪曾祺去世后,他的书不断地再版。尤其是近十年,汪曾祺作品的出版达到了一个高潮,无论是数量之多,还是版本之繁复,编选角度之多样,可以说是叹为观止,当代作家家里,无人可出其右。千秋万岁名,寂寞身后事。汪老身后不寂寞,还邂逅了不少隔代知音。”

作为家人,深深感恩万千读者的追捧,也感谢各家出版机构的厚爱。但借此次活动之机,也想给汪曾祺作品的出版热降降温,毕竟老头儿已去世20多年,不会再有过多未世或此前遗漏的作品供反复编选,过度消费对于作家本人和出版机构的形象声誉都非益事。希望出版机构能将更多目光放到当代作家身上,更多支持中国文学的当下和未来。

也希望创作者、评论家、研究者们能够与网络时代实现更好的磨合共融,让更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得到更广范围的传播和认可,吸引更多人回归文字之美、品读生活之味。

■纪念

巨大的“诗心”:在宇宙的量子雨中跳舞

—怀念作家黄孝阳

作品,才惊讶地发现,我的身边竟坐着一位大作家!我在《南方文坛》杂志,发表了谈黄孝阳与先锋文学关系的论文。2019年秋,他的长篇小说《人间值得》出版,我邀请他来苏州大学做文学讲座。孝阳讲起他的创作滔滔不绝,眼里闪烁着孩子般的顽皮。

他的身体不好,但工作敬业,创作上则有着圣徒般的虔诚,经常熬夜写小说。2020年8月,我来南京开会,那天晚上我们喝得不少。我看到他满头冒汗,嘴唇发白,劝他不要再喝了,邀请他晚上去我住的酒店,这样的话,如果有事,随时可以帮助他。他拒绝了,骑着电动车摇摇晃晃地回了家。我回到酒店,越想越不放心,连续打了好几个电话,他都没接,我非常担心,第二天早上7点多,我再打电话,他才接了,笑呵呵地说,没啥事。我说,老兄悠着点,独居男人要注意,万一在家里发病,也没人发现,太惨啦。没想到,我一语成谶,孝阳竟真这样走了!我恨自己,为何不多关心他一点。大雪纷飞的深夜,我躲在卫生间哭泣。听朋友说,他就是在卫生间地板上,最后挣扎着离世的。我点燃一根瘦瘦的火柴,花火刚在黑暗中绽放,就陡然熄灭。我躺在温暖的酒店房间,想象着他此刻独自在太平间冰冷的铁床上,就心痛得不能停止流泪。风雪夜中的酒店,每个灯火辉煌的窗前,都有一个孤独而渴望答案的灵魂。而孝阳喜欢在深夜写作,他像勇敢的骑士,和世界做着搏斗。深夜属于真正的思想者,孝阳奋笔疾书的那些深夜,肯定有无数寒冷像一根根针刺进他的毛孔,让他血脉偾张,让他不能不对日常而庸俗的社会产生巨大质疑。这些东西,他都化为漫天星雨般的灿烂文字,绽放在别人的天空。他留给世人的,永远是那张善良和平的脸,那颗悲悯纯真的“心”。1997年4月11日深夜,王小波在北京顺义独居房因突发心脏病离世,2020年12月26日深夜,黄孝阳在金陵南京的独居房也因心脏病撒手而去。冥冥之中,对中国优秀的作

家,竟有着某种神秘的命运联系。他们都是对中国文学献祭了“心灵”的作家,他们将心燃烧成一团团火,在广袤的宇宙,在博大神秘的量子雨中,进行着快乐的舞蹈。

孝阳离开那几天,他的文字刷爆了朋友圈,但海量文字碎片过后,他最终被淹没在美食自拍秀、会议领导合影、冬天野外美图、疫情小道消息、各类炫娃炫富炫聚会的信息中了。但我坚信,“黄孝阳”这个名字将留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,这不仅因为他洋洋大观的7部长篇小说与3部中短篇小说集,更在于他是1990年代后先锋文学“中国本土化”的集大成者。新时期以来的先锋文学,曾照亮了文学的天空。但是,90年代之后,先锋文学迅速失去影响力,究其原因,除了外部环境改变之外,中国文学本身缺乏对世情传统的反思,也是重要原因。从先秦神异故事、汉代志怪、魏晋笔记、唐代传奇、宋代话本,再到明朝清回,中国小说对世俗人生有浓厚兴趣,无论江湖神魔、奇谈逸闻,还是宫闱秘史、百姓世俗生活,都是为愉悦人生服务。尽管晚清以来,从清末新小说到五四新文学,以小说表现严肃人生和对世界的探索,已渐渐被大家所接受,但是在90年代持续至今的消费主义狂潮之中,文学难度的丧失,文学精神追索能力的丧失,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。

黄孝阳曾笑谈,他其实是现实主义者,但大家都把他看作先锋小说家。在我的理解之中,他是一个将中国现实“化为”先锋写作的小说家。他对中国现实问题,同样有着深切的关注和严肃的批判,所不同的是,他鄙视那些没有艺术创新力的“偷懒的现实主义”。他和当下那些所谓后现代先锋小说家有着本质区别。他不会给作品寻一个轻巧甜腻的名字、一个古怪讨巧的题材,他不会将作品变成残缺晦暗、不知所云的迷宫,更不会将之变成一种中产阶级妇女阅读的精致人设、一种城市小资的情感自慰器。他的先锋精神,表现在他时刻对于那些暗藏在形式炫技

中的妥协苟且的警惕,对那些自称“贴近生活”创作中的媚俗气息的厌恶,更表现在他敏锐地捕捉到科技对世界的改变,特别是对人类生存方式、时空观念和价值观的改变。这些改变有些轰轰烈烈,有些则悄无声息,让我们身在其中而不觉。

这几年与孝阳的交往,让我看到了一个有“赤子之心”与很高艺术追求的文学家。他的文学观有着后现代主义的影响,更倾向于将世界看成某种结构性的存在,而这种存在不仅改变了我们,且改变了我们认知的现实:“我们在进入一个卡尔·波普尔所预言的开放社会,‘一个蜂巢似的有机体’。这是一个比《百年孤独》还要魔幻百倍的匪夷所思的新现实。它还在不断加速,且每一秒都比刚流逝的那一秒更快一点。我把这个新现实称之为知识社会。一个知识生产呈指数级增长的块茎结构,一个人可能真正获得主体性(自由)的个人时刻,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戏剧性现代性景观,一个‘技术奇点’随时可能爆发的前夜。”在我理解之中,他的《众生:迷宫》《众生:设计师》《人间世》《乱世》《人间值得》等小说,传统线性小说时空观、小说人物观、小说语言观、小说故事观,都被进行了彻底拆解和戏仿。历史、启蒙、人性、现实等众多宏大叙事符号,也在他的小说中被结构化了,更多显现出存在的纹理和轨迹。读他的小说,犹如接近一片量子风暴、一张宇宙星云图,而纷繁复杂的信息中,依然能看到镶嵌在文字缝隙中对现实问题的批评和嘲讽、反思和宽容。

黄孝阳很多创作思路与王小波类似,但文学表现形态却截然不同。王小波是在90年代多元化开启之际,以先锋的智性探索和现实的讽刺书写,呼应着文艺复兴磅礴的人性自由誓言,黄孝阳所要解决和面对的,则是一个被资本全球化冲击的中国,一个信息升级换代的“互联网丛林”世界。或者说,黄孝阳更像是“数字时代”的王小波。他们的文学内核都有用文学开启智慧,增强中国小说精神探索力的核心价值观。



黄孝阳

2020年末,南京,暴雪肆虐。大地的一切,都陷入了寒冷的忧郁。维景国际酒店玻璃窗前,我拨打那个熟悉的电话,却永远不再有回音。同来开会的王尧老师发微信语音告诉我:孝阳走了。我不敢相信。第七届紫金山文学奖颁奖在即,孝阳的长篇小说《人间值得》刚获得长篇小说奖,我到酒店报到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和他联系,讨论文学,特别是他刚杀青的长篇《新生》。这一切,都在2020年12月28日的那个下午戛然而止。望着窗外的雪花,我流着眼泪,写下简短的小诗:“漫天狂风漫天雪,独立金陵思故人,故人不知何处去,空留余泪凝雪中。”

我和孝阳相识时间不长,但“迅速”成了好友,这起源于我在2013年出版的《王小波传》。我读到过孝阳写于西胡同纪念小波的文字。当读到“王小波之死,犹如一根巨大的铁钉,缓缓地钉进了心脏”,我深深地被他感动,在书的后记谈到这位自称“王门大弟子”的青年作家。2016年,我从山东南来苏州,在南京的文学活动中见到了黄孝阳,当时有点发愣:一样肥短的身材,滚圆的脸,一样是“70后”文艺大叔,一样是王小波的信徒,一样是小城低学历青年出身,一样是“伪单身”中年男,妻儿在远方,独自在他乡打拼。我们相视而笑,自嘲是“前世失散的兄弟”。于是,就有了各种酒场,胡吹海侃的聊天。我来南京,他请我吃饭,也深谈到半夜。我对他“量子文学观”不熟悉,等到阅读了他的大量

原上草